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1.01.005

# 论民族主义与《湘报》新闻思想的近代转型

阳海洪<sup>1</sup>, 阳海燕<sup>2</sup>

(1.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8; 2. 长沙学院 图书馆, 湖南 长沙 410022)

**摘要:** 民族主义是建立在“主权”观念基础上的民族自我意识和情感归属, 旨在维护本民族权益、实现本民族和民族国家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 其在实践中往往演化为建立和发展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运动。在民族主义话语中, 作为“人民”的民众从历史“后台”向历史“舞台”前置, 媒介作为国民的“养成所”, 被置于民族救亡与国家建设的中心地位。在人民主权的民族主义话语中, 《湘报》报人提出了“报为民史”的传媒属性观、“开启民智”的媒介功能观与“志士精神”的新闻伦理观, 推动了湖南新闻思想的近代转型。《湘报》所建构的新闻思想, 既接受了“民权”等现代价值观念, 又具有儒教的道德激情, 其对近代湖湘文化转型, 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 《湘报》; 民族主义; 新闻思想; 传媒属性; 媒介功能; 新闻伦理

**中图分类号:** G219.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1)01-0036-07

**引用格式:** 阳海洪, 阳海燕. 论民族主义与《湘报》新闻思想的近代转型[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6(1): 36-42.

## On Nationalism an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News Thought Constructed by *Xiang Bao*

YANG Haihong<sup>1</sup>, YANG Haiyan<sup>2</sup>

(1.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2. Library, Changsha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22, China)

**Abstract:** Nationalism means the national self-awareness and emotional belonging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It aims at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nation and realizing the ideas or ideologies requir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In practice, nationalism often evolves into a social movement to establish and develop a modern nation-state.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ism, as the “people”, the masses have moved from the “backstage” of history to the “stage” of history, and as the “nurturing place” of the people, the media has been placed in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national 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ism believing in people’s sovereignty, the journalists of *Xiang Bao* put forward the media

收稿日期: 2020-11-1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报刊与近代湖湘文化转型及其认同研究(1897—1919)”(18YJA860018);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重点课题“湖南现代化——报刊与湖南早期现代化(1897—1919)”  
(XSP19ZD1020)

作者简介: 阳海洪(1969—), 男, 湖南冷水江人, 湖南工业大学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新闻史论;  
阳海燕(1972—), 女, 湖南冷水江人, 长沙学院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文化史与文艺批评。

attribute view of “newspaper as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 the media function view of “opening people’s wisdom” and the news ethics view of “noble spirit”, which promote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Hunan’s news thought. The news thought constructed by *Xiang Bao* not only accepted the modern values such as “civil rights”, but also had the moral passion of Confucianism, which has a deep impact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Hunan culture.

**Keywords:** *Xiang Bao*; nationalism; news thought; media attribute; media function; news ethics

民族主义是“关于政治合法性理论”，其产生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同步，是近代以来世界最为强劲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之一。受限于立场、角度、观点和方法的差异导致的分歧，以及“民族主义”本身结构复杂、流动多变的影响，“民族主义”没有一个公认的、普遍适用的定义，但我们可以大致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现代性范畴。近代意义的民族主义，是伴随欧洲民族国家建构而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最初动力。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是思想的解放，文艺复兴运动使人们摆脱了神权，追求人权，为民族主义的产生准备了思想武器；当经济与政治条件都具备后，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建立的民族国家催生了近代民族主义。“在欧洲，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本身就是民主革命（或改革）和民主主义的产物。”<sup>[1]</sup>

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传统中国是以“夷夏之辨”为核心来构建的，这种民族观念是以传统文化作为凝聚民族的基础，是一种文化主义的民族观，其以“天下主义”和“大一统”为认同目标。在现代民族主义理论体系中，民族与国家同构，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是统一的，民族被视为国家主权的象征与标志。中国传统民族主义以“文化”而非以“民族”作为区分依据，秉持文化与政权同一的政治原则，他们认为，“天道”“仁政”是超越于民族、国家的普世价值，并由此发展出一套“天下为公”“天下归仁”的政治叙述。同时，传统民族主义是以宗法血缘为文化认同的，“权利”意识稀薄。因此，近代中国历史既是由“天下”向“国家”转型的过程，也是由“专制”向“民主”转型的过程。湖南地处内陆，“素尚闭关之见”，但中国在甲午之战中败于岛国日本，给中

国知识界以相当刺激。战争期间，时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奏请统率湘军赴朝督战”，获清廷允准，“带勇北上”，率湘军出关抗敌，结果却全军覆灭，湘人对此深感耻辱。战败的刺激及战败后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掀起的瓜分狂潮，波斯、埃及等国家沦为殖民地，以及印第安人、非洲黑人的悲惨遭遇，催生了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危机意识、救亡意识。因此，《湘报》在湖南的出现，不是本土经济关系的产物，而是民族危机刺激的结果，是一批初步接触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因“蒿目时艰，思出其心力以造成群力，而通于国力者也”<sup>[2]57</sup>。甲午之役的失败，使中国知识分子从中西民族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角度来审视战败的根源。民族主义是从“主权个人”隐喻中引申出来的基本原则。

“民族之于世界犹如个人之于社会，对于内有绝对之所有权，对于外有绝对之独立权。若一民族起而建立独立自治之国家，无论何人，无对抗之权。此民族主义之本旨。”<sup>[3]</sup> 西方国家“人人有自主之权”，国民聪慧自强，具有强烈的爱国心，而中国统治者以愚民弱民为秘术，压抑民权，禁锢民智，遂使民愚国弱，国家失去了依存根基。尽管中国地广民多，但因国家意识缺乏，民心涣散，遂成散沙之国。“今中国官自为官，民自为民，士自为士，工自为工，农自为农，商自为商，故今日谓中国为四万万人之国，亦无不可。”<sup>[4]118</sup> 在《湘报》看来，民主不仅是政府组织形式，而且是社会结合方式。以权利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其良好运行，对社会的文明程度及民众的道德共识是有要求的。维新报人主张以“新民”方式实现中国的民族主义目标，为中国提供了全方位的民族自我更新蓝图。如此，民众从历史“后台”向历史“舞台”前置，媒介作为国民的“养成所”，被置于民族救亡与

国家建设的中心地位,其标志着古代中国新闻思想的现代转型。

## 一 “报为民史”:民族主义与《湘报》的传媒属性观

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设立史官,“君举必书”,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先秦时期,史官几乎参与了当时所有的文化、政治传播活动。这种传播活动,自然也是新闻传播的过程。“古代史官通过‘承告’和‘传闻’两种方式获得信息,所谓‘承告’是指别国史官的正式通报,构成官方史录;而所谓‘传闻’,则是史官私下交流的信息,其内容涉及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等,以补充前者的不足。”<sup>[5]</sup>以今日眼光视之,这两种方式都是新闻传播活动。后来史官以整理典籍、记载历史为业,与新闻传播也就日益疏远。正因为写史与办报之间的高相关性和史书在中国古代政治中的重要性,现代报业舶来东土后,早期报人将报刊与史籍比附,以改变士大夫阶层关于报刊乃“琐语”的陋识,提升报刊的重要性和论证办报的合理性。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民族主义兴起,梁启超将“君史”“民史”并列,报刊作为“民史”,隐然与史籍并驾齐驱。在梁氏看来,“中国之旧史”都为君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因而难以建构国民的民族国家意识,不利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因此,必须进行“史学革命”,叙述中华民族的进化轨迹,为老百姓树碑立传,以树立国民意识。梁启超“君史”“民史”二分,抬高“民史”、贬低“君史”的观点,引起了《湘报》报人的相当同情。唐才常认为,报馆契合“史载笔,士载言”的史书传统,故报馆即“史馆”。

泰西不立史馆,该报馆即其史馆也。凡遇开议院时,君主临焉,王公大臣暨各议员临焉,无论事之大小,各伸其说,以剖判是非,报馆即书之以传诸一国,布诸五洲。记有之,“史载笔,士载言”,其遗意欤!故语无忌讳,言多实录,视中国之史书为尤足信。况其推广新闻纸之多,虽至酒楼茶肆。往往而有。是史馆为一国公有之权,史学乃四民与知之业。且凡民数、地数,比较多寡,火车、铁路、电线,推算方里,货殖出入吨数,

以及官制、教会、学校、国计、兵数,靡勿登记赅核,与中史各表志例同。……盖今日之报章,即异日之史料,政治家、格致家、律法家,胥权衡于此,一举而三备焉。故西国之有君史又有民史者,诚重之也,诚慎之也<sup>[6]</sup>。

在唐才常看来,报纸能为“民史”,在于其拥有如下特质:一是报纸真实记录了议会的各种政治辩论,符合中国“史载笔,士载言”的史书传统;二是报纸详细记录了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与中国史书体例之“表”“志”相同,足以观“闾巷风俗”,即透过报纸能详细了解民情,故西方政治家对其非常重视。因此,西方既有作为“君史”记载的史书,又有作为“民史”记载的报纸。谭嗣同再申此义,提出了“报为民史”的思想观点,并明确提出他的这种观点受到了梁启超的“君史民史之说”的影响。

从比附史籍、分享史籍在中国知识体系中的权威以提升报刊的重要性,到“君史”“民史”并列,报刊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优势性;再到“君史”为“一家一姓之谱牒”,使民众成为“喑哑之民”,民愚国弱。《湘报》报人据此确立的“史馆为一国公有之权,史学乃四民与知之业”<sup>[7]</sup><sup>[82]</sup>“报为民史”的属性认知,否定了“君史”作为“私史”的权威性。民权概念的出场,推动了新的新闻观念与传播方式的出场。

### (一) 报刊为民权之载体

在《湘报》报人看来,现代国家依“民权”原则而来,国民乃国家之基础与合法性之源泉。传统史书记载的只是皇帝之起居,“极其指归,要不过一姓之谱牒焉耳”<sup>[7]</sup><sup>[72]</sup>,而广大民众笼罩在皇权之下,不见于史书之记载,而成为“喑哑之民”,国民意识和社会公德难以培育。“报为民史”意谓民众作为民族、国家的主体,自然要成为新闻的主体,报刊应成为记载民众生活之史书。报刊需要建立新的修辞策略和书写方式,将视线下移,深入底层民众,真正反映民众的生活,以彰显其公共性。报纸做到了“报为民史”,也就做到了“国有口矣”,因为在维新报人看来,国乃积民而成,民众是国家之主体与基础。报刊成为民众之“喉舌”,也就是国家之“喉舌”,而不是君主一家一姓之“喉舌”。只有借助报刊的新闻修辞策略,将日常生活形塑为具有情感功效的话语实践,民



众才能形成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尽管维新报人没有提出明确的“知情权”“接近权”“参与权”等概念,但他们已朦胧感觉到报刊是公民权利的载体,其能保障公民能够接触到真实信息,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 (二) 报刊为史家实录之记载

中国史官文化发达,在儒家看来,交流当为“信言”,撰述当为“信史”,史官也因此在其传播实践中练就了以“实录”精神为核心的“春秋笔法”。“春秋笔法”源于孔子在《春秋》中对南史、董狐等良史“书法不隐”的称颂,它将史书撰写的经法、史法和文法统一起来,创立了据事言理的史学传统。汉代史学家班固在总结司马迁《史记》的史学成就时,将“春秋笔法”概括为“实录”。

“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sup>[8]2070</sup>实录精神要求史家对历史人物的“善恶之行”进行如实记录,并根据儒家标准对其做出恰当其分的历史评价,达到“使乱臣贼子惧”的史学效果,是为史家“实录”精神。在事实信息层面,史家实录强调“文直事核”,言必有征,史必考证,成为“信史”。概言之,史书作为接近和认知儒道的最直接、最主要的途径,承担确认文化与政治正当性的核心功能。史家实录精神与现代科学精神所追求的全面真实、客观中立报道世界的新闻真实观念不同,它将史书撰写视为按儒家之道对历史事实进行有目的的选择过程,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是融合在一起的。如此一来,“信”与“义”合,“事”与“理”合,“史”与“经”合,其以儒家思想引领和规范了对历史的阐释和认知,形塑了士人共同体的价值观念。

“报为民史”的媒介属性定位,否定了“君史”的经典性和神圣性,因此,在《湘报》报人的媒介认知中,对世界的“真实”反映,既是道德勇气与社会责任的问题,更是对客观世界的认知问题。与传统史籍相较,报刊作为民权的载体,突破传统“君臣伦理”的限制,记者以“直接在场”的方式,亲临新闻现场,直书所见,更能彰显史家实录精神,报刊“语无忌讳,言多实录,视中国之史书为尤足信”<sup>[6]7</sup>。谭嗣同认为传统史籍为君主之谱牒,史家直笔精神消失殆尽。“徒专笔

削一己之私,滥褒诛于兴亡之后,直笔既压累而无以伸,旧闻遂放失而莫之恤。”<sup>[7]82</sup>“报为民史”的媒介属性表明,惟有作为“民史”的报刊才能真正“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记载详实,成为表达民众利益诉求之“喉舌”,承担“民史”与“国口”之责任,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见证者和推动者。借助报刊的新闻修辞策略,将日常生活形塑为具有情感功效的话语实践,民众才能形成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

民族主义的本质是一种政治合法性理论,它要求国家所有权力都来源于民族整体——人民,“人民主权”是民族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简言之,作为“国家”的“Nation”与作为人民的“People”是同义的。“人民主权”的民族主义原则改变了“官营官阅”和民众不能“与闻国事”的陈腐观念,其主张传媒要向普通百姓开放,成为表达群众声音、维护群众利益的“喉舌”。

## 二 “开启民智”: 民族主义与《湘报》的媒介功能观

在报人对西方的“富强”想象中,“民权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扣结,它紧系着政治的振兴,国家的强盛。只要这个扣结被揭开,中国的枷锁也就自然松脱了。”<sup>[9]</sup>谭嗣同曾如此评价《湘报》:“盖方今急务在兴民权,欲兴民权在开民智。《湘学报》实钜声宏,既足以智其民矣,而立论出处注射民权,尤觉难能而可贵。”<sup>[10]270</sup>《湘报》从第26期到第28期,连续刊载了梁启超的长篇论文《论湖南应办之事》,该文就说:“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sup>[11]201</sup>“权”“智”相依,“权”生于“智”,而“智”又生于“媒”,民智的养成与其信息获得的多寡成正比,愚民是君主垄断了信息资源和传播媒介的结果。“历来的独裁者都知道,文盲群众最容易统治;因为阅读的技巧一旦学会就无法抹消,退而求其次,只能限制它的范围。因此,书籍和其他人类造物不同,一直是专制统治的眼中钉。绝对的权力要求一切读物都得是官方读物;不要整座图书馆的嘈杂意见,统治者的话就是一切。伏尔泰在一本讽

刺小册子《关于阅读的可怕危害》中写道:书本‘驱除蒙昧,而蒙昧向来是完美控制之国家的监管与保护工具。’因此,各种花样的检查制度就是施展控制力的必然结果,而阅读的历史就被检查官一连串似乎无止尽的烟火所照亮。”<sup>[12]345-346</sup>正是看到了民智与信息之间的深刻关联,《湘报》从其“报为民史”的媒介属性认知出发,意识到近代报刊是一种与史书、邸报不同的知识生产机制,朦胧感觉到报刊所具有的信息性、时效性、连续性和大众性等新型特征,其为民众参与政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唐才常、谭嗣同等湖湘士子,以湘人的民族主义意识觉醒为目标,将“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作为《湘报》宗旨。广办报刊,开启民智,传播西方文明,推动国家政治变革,几乎成为《湘报》报人的共识。

#### (一) 报刊能输民以知,满足民众的信息需求

不管政治如何强调自身的人民性,政治始终是少数人的事情,掌握于精英手中,精英与民众之间,必须以某种方式连接与沟通起来。“因为在政治领域内传播过程具有一种根本性的功能。很少有人能直接看到形成政治过程,甚至仅其一小部分形成所产生的结果:人们必须转而依靠一个沟通体系,以使他们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都能理解政治的实质。”<sup>[13]175</sup>报纸要开启民智,培养国民意识,必须利用报纸向民众开放政治过程,引导受众参与政治讨论。而此讨论的前提,是依赖“沟通体系”向其提供丰富全面的信息。在《湘报》看来,报刊与史书一样,分门别类,万象森罗,内容丰赡。“且凡民数、地数,比较多寡,火车、铁路、电线,推算方里,货殖出入吨数,以及官制、教会、学校、国计、兵数,靡勿登记核算,与中史各表志例同。”<sup>[6]7</sup>报刊因其“民史”性质,已不限于“一家一姓之谱牒”范畴,而需记录“民之生业”“民之教法”“民通商、惠工、务材、训农之章程”,成为民众生活的历史记录,并使自己的内容更为全面。史书作为精英读物,它所面向的读者层是士大夫阶层,而报刊是大众读物,面向普通民众的,报章为“总宇宙之文”,“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曰宙,罔不兼容并包,同条共贯,高挹遐揽,广收毕蓄,识大识小,用宏取多”,为范围最广泛、内容最丰富的文体。自古文章,“未有如报章之备哉灿烂者也。”<sup>[14]413</sup>报纸能将信息“传诸一国,布诸

五洲”,无远弗届。这种遍及效应让“避处之士,不出户庭而知全球之事”,培养自己的理性判断能力,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 (二) 报刊能抒发民声,满足民众的权利诉求

报馆既为民意之机关,应当成为民众的喉舌。报人要代民立言,反映民情,通达民隐,表达民众诉求,维护民众利益。古代史书“于民之生业,靡得而详也;于民之教法,靡得而纪也;于民通商、惠工、务材、训农之章程,靡得而毕录也,而徒专笔削一己之私,滥褒诛于兴亡之后,直笔既压累而无以伸,旧闻遂放失而莫之恤。溢之曰官书,官书良可悼也!不有报纸以彰民史,其将长此汶汶闇闇以穷天,而终古为喑哑之民乎?”<sup>[7]82</sup>面对种种恶行,报人要以侠义为怀,节不为威胁所夺,志不为利益所诱,身不为斧钺所惧,路见不平,拔“笔”相助,伸张正义,揭露真相,帮助民众获取外界信息,表达自身意志,构筑具有理性认知能力的主体。

### 三 “志士精神”: 民族主义与《湘报》的新闻伦理观

面对民族危机,《湘报》痛感愚民政策下民众国家精神的缺失,因而倡导“新民”,要求报刊开启民智,助民主权,焕发国人竞争心理和责任意识,将中国建成以政治美德和民族情感为纽带的伦理共同体。在“新”与“民”中,他们更加关注“新”所体现出来的国家意识和无私精神。报人作为已“新”之民和启蒙主体,自然应该“有益于国事”,成为社会表率 and 民众楷模。这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志士”伦理,要求报人以责任主体进入报界,承担民族救亡的责任。

#### (一) 报人要“立言救国”,具有责任感

梁启超从其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认为“报馆有益于国事”,报人所能报答国家的,“惟恃此三寸之舌,七寸之管”。报人要不计个人利害,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将中国推入现代文明轨道。《湘报》认为,广办报刊,开启民智,是如佛祖普度众生一样的宗教事业,充满“救世心态”。“佛法以救世为本原,墨子以兼爱利天下,彼非不度其身也,然度我即度众生,度众生即度我。我论语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此春秋公法家所以开大同之派也。美哉美哉,日报之功,其度



众生之本哉。”<sup>[15]105-106</sup> 报人要抱着“舍我其谁”的精神,敢为天下之先,担当济世拯民的宏大责任。

“夫求新者既洞悉十九周以后之地球,必文明大启,又灼知孔教杀身成仁,佛氏大雄大无畏之旨,与夫意大利、奥斯玛加、日本之变法,俱一二奇人侠士为之,遂决然毅然,舍身度世,以捍天下之危难,无所与茶。”<sup>[16]416</sup>《湘报》的职业伦理,充满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使命感,认为人为了实现“济世救民”的道德理想,必须敢于把生命奉献出来,以实现个体人格的完满。

## (二) 报人要“敢言直言”, 具有正义感

湖南新政改革是在“非现代”的专制主义语境下展开的,缺少西方工业革命与市场经济而来的时代基础。在改革缺少民意基础、阻力很大的情况下,维新派只能将希望寄托了少数的同道者身上,中国要如日本一样,“全恃二三侠士仁人,出死力,排众议,以成今日维新之治”;“以二人心力所搏,遂辟中外大通之局,亚东首出之雄”<sup>[17]41</sup>。新政改革将希望寄托在“二三豪杰之上”,迫切需要先进分子站出来,推动改革向前进行。《湘报》要求中国知识分子向其他国家的改革者学习,具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他们认为,改革阻力越大,对报人的职业品格要求就越高。这种职业伦理隐含着对人的道德伦理和精神力量的信念,认为人的思想和意志是改造外在世界的动力;只要将这种精神力量发掘出来,就能求得改革的胜利。“夫求新者既洞悉十九周以后之地球,必文明大启,又灼知孔教杀身成仁,佛氏大雄大无畏之旨,与夫意大利、奥斯玛加、日本之变法,俱一二奇人侠士为之,遂决然毅然,舍身度世,以捍天下之危难,无所与茶。”<sup>[16]416</sup>这些先行者在创办报刊、推动变法维新事业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了改革的阻力之大。“而彼守旧以尼之者,不过师老杨之柔静为我,如臧武仲所讥齐侯故智,从而阴掣之,抵排之;而又以身家性命,横梗胸臆,樊然交战于其中,此其愚亦可笑,而其巧为牵制,以待西人之刀俎圈牢,尤可骇可闻!”<sup>[16]416</sup>先驱者在投身变法维新事业时,鉴于历史上改革者之教训与环境之恶劣,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意识到了结局的。“嗟乎!举二十三行省俯首帖耳、并身牛马、无复他望之时,惟吾湘志士仁人,五情震悼,慨然奋兴,并日而谋,同心而济,图一发千钧之系;

而国之存否,君父之安否,身家之全否,尚未可知。”<sup>[16]416</sup>因此,办报者要有佛家慈航普度、舍身饲虎的精神。

在民族主义话语中,国家具有至高无上性。“民族主义意味着对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忠诚超越于其他任何对象。”<sup>[18]</sup>报纸乃“国之利器”,报人职业追求应由向文化效忠向国家效忠转型,民族利益为报人职业观提供了终极关怀和道德支撑,成为早期报人建构新闻伦理的思想资源。在《湘报》的职业伦理建构中,虽缺乏新闻专业意识,但却充盈着强烈的公共关怀和家国意识。他们认为,报人应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变法维新,学习和借鉴西方文明,启蒙和促进社会风气的转化,挽救国家危堕的局面。作为清末变局下“救亡”的产物,近代传媒及其思想建构具有强烈的家国情结。国家利益的绝对律令,使近代传媒甫一出现,就承担了超出新闻之外的道德负荷,这对中国新闻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百代多行秦政制”,帝制中国将意识形态教化与行政官僚体制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体化”的传播秩序,并与科举教育、官员选拔融合在一起,垄断传播资源,向民众推行格式化的意识形态教育。“一体化”传播秩序虽将体量巨大的多民族国家抻在了一起,建构了“大一统”的帝国认同,但民众不能“与闻国事”,对公共事务和国家利益漠不关心,国家也因此处于“低组织化”水平。近代以来,东西方之间民族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使《湘报》看到国民素质与时代要求之间的巨大落差,意识到了传媒在传播新知、启迪民智方面的巨大功用,因而在国民素质与国家强盛之间的逻辑关联中,《湘报》以“智民”“新民”为核心概念,形成了一条“西方国民优秀——中国国民愚昧——办报新民——再造国家”的民族主义逻辑链条。他们认为,西方的先进来自其民众的优秀品质,中国要改变现状,需要合群与西方竞争;而国人民心涣散,民智愚昧,不具备西方之民的素质,需要广办报刊,传播西方文明,将“旧民”改造为“新民”,鼓舞广大民众的救亡激情,“造就一个以近代国家观念和自由权利思想为基础,以社会公德为规范,以自尊、自治和竞争冒险精神为价值导向的新型国民群体”<sup>[19]</sup>,如此方能实现

国家强盛的目标。由此,他们提出了“报为民史”的媒介本质观、“开启民智”的传媒功能观、“言文一致”和“志士精神”的职业伦理观等新闻思想。简言之,近代报刊是在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中建构自身合法性的。凭借民族救亡的道德权威,现代新闻思想才浮出历史的“缝隙”,并迅速焕发出社会动员力量。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动员机制,要求报刊通过其濡化功能,将臣民改造成国民,以责任主体的身份进入国家,承担救亡责任。这种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闻思想,要求报人作为“先知先觉者”,将开启民智、助民主权作为救国之“第一义”和“最急之务”,因而其一再强化传统中国的士大夫意识,显示出强烈的志士精神与敢于担当的侠义情怀。这种既接纳了“民权”“民主”等现代价值观念,又具有浓厚儒家理想情结的新闻思想,孕育了“敢为天下先”的湖湘精神。在《湘报》报人看来,在中国的民族复兴中,“湖南虽贫国,然士气慷慨尚侠,有萨长肥土之风,腹地居中,与欧洲日耳曼为近”,湖南将会如德国、日本一样,成为中国民族复兴中的“初出地平之星”和“骤起之飘轮”。《湘报》报人的这种认知,对于近代湖湘文化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

#### 参考文献:

- [1] 何家栋. 中国问题语境下的主义之争: 就“中国民族主义”与王小东商榷[J]. 战略与管理, 2000(6): 102.
- [2] 戴德诚. 变学刍议[M]//《湘报》报馆. 湘报: 上卷(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3] 佚名. 民族主义[J]. 江苏, 1904(7): 17.
- [4] 南学会问答[M]//《湘报》报馆. 湘报: 上卷(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5] 过常宝. 《左传》源于史官“传闻”制度考[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4(4): 32-37.
- [6] 唐才常. 史学论略[M]//唐才常. 唐才常集. 长沙: 岳麓书社, 2010.
- [7] 谭嗣同. 湘报后叙下[M]//《湘报》报馆. 湘报: 上卷(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8] 班固. 汉书: 卷六十二(二十四史简体字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9] 王人博. 民权词义考论[J]. 比较法研究, 2003(1): 5-25.
- [10] 谭嗣同. 谭嗣同全集[M]. 蔡尚思, 方行, 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11] 梁启超. 论湖南应办之事[M]//《湘报》报馆. 湘报: 上卷(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12]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 阅读史[M]. 吴昌杰,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13] 鲁恂·W·派伊. 政治发展面面观[M]. 仁晓, 王元, 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 175.
- [14] 谭嗣同. 报章总宇宙之文说[M]//谭嗣同. 谭嗣同集. 何执, 编. 长沙: 岳麓书社, 2012: 413.
- [15] 杨概. 论阅报之有益[M]//《湘报》报馆. 湘报: 上卷(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16] 唐才常. 辨惑: 上[M]//《湘报》报馆. 湘报: 上卷(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17] 唐才常. 论热力: 上[M]//《湘报》报馆. 湘报: 上卷(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18] CARLTON J. H. Hayes, Essays on Nationalism[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8: 5-6.
- [19] 暨爱民. “新民”与“新国”: 关于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内涵[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24(4): 65.

责任编辑: 黄声波